

略論中國國民黨之社會民主黨性質

◎ 王炯華

社會民主黨最早出現在19世紀40年代的法國。這裏所說的社會民主黨主要是指19世紀後半葉以來出現的社會黨、工黨、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工黨等以民主社會主義為基本行動綱領的各種社會主義政黨的總稱。歷史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是恩格斯）的政治生涯中有很長一段時期是與社會民主黨的活動聯繫在一起的。

關於中國國民黨之社會民主主義問題，最早是李達先生提出的。1923年5月，他在《新時代》發表《馬克思學說與中國》這篇可視為當時中國馬克思主義水準的標誌性文章中，不僅初步提出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這一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而且闡述了國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共產黨對於國共合作應取的方針，並認為「中國國民黨似乎是一個社會民主的黨派，有資本家、知識份子及勞動者三種黨員，共產黨至好是影響他們向左傾。」顯然，李達是從組織成分上認定中國國民黨之社會民主黨性質的，這在當時是一種頗合實際的認定。

本文將進一步從歷史與現實方面略論中國國民黨之社會民主黨性質。

中國國民黨前身是孫中山組織和領導的同盟會。同盟會雖然主要是由知識份子組成的革命組織，並未標明其社會主義政黨性質；但是，卻具有明顯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

首先，孫中山從英國去日本組織同盟會途中，曾在當時第二國際總部所在地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停留，訪問第二國際書記處，提出接納他的興中會為第二國際成員的請求，只是因為第二國際書記處書記王德威爾得、胡斯曼等人認為當時落後的中國還不具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未予批准而已。但是，孫中山並未氣餒，他在布魯塞爾購買了一批社會主義書籍帶往日本，後來悉數交給中國社會黨領袖江亢虎研究。這表明同盟會成立前夕，孫中山已具有明顯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

同盟會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則直接表現於其指導思想和政治綱領，這就是孫中山所制定的三民主義。

1905年，在由孫中山口授、胡漢民執筆的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發刊詞」中，三民主義第一次問世。孫中山說：「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洲各國以獨立。泊自帝其國，盛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僕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也。」這就是說，孫中山以歐美進化之經驗，揭櫫民族、民權、民生

三民主義之意義，更張二十世紀民生主義之大旗，其思想真可謂融合中外、貫通古今之創造；其革命也屬救國拯民之深思和遠慮！也就是說，孫中山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拋棄了同盟會之前身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驅除韃虜」一類狹隘民族主義，而具有國內外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涵義；民權主義，也就是民主主義；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孫中山後來一再強調這一點。

接著，胡漢民之《民報之六大主義》一文又第一次完整、準確地闡述了三民主義，並具體揭示「本雜誌（《民報》）之主義」六項：（一）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二）建設共和政體。（三）土地國有。（四）維持世界真正之平和。（五）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六）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它既是《民報》詳確的宣言，也是同盟會的六條政綱。其（一）（二）（三）條對內為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四）（五）（六）條則為對外之手段。胡氏這《民報之六大主義》則被視為「同盟會時期受孫先生指導，公認之革命綱領」。

胡氏在闡述「民報之六大主義」第三項時直接提到社會主義。他說：「近世文明國家所病者，非政治的階級，而經濟的階級也，於是而發生社會主義，其學說雖繁，而皆以平經濟的階級為主。」他認為，社會主義又可分「共產主義與集產主義」。土地國有則是集產主義的一部分，如果用國有主義解決土地問題，「社會主義乃順於國民心理，而又擇其易者以從事，其成功非獨所期，殆可預必也。」

特別是，胡漢民主編的《民報》與梁啟超的《新民叢報》之間，還進行了一場極富意義、影響深廣的論戰。

1906年3月，梁啟超以飲冰室筆名在《新民叢報》發表《開明專制論》，極言社會革命之可怖，認為「若乃欲以野蠻之力殺四萬萬人之半，奪其田而有之，則靡特人道不應有此豺性，即社會主義之先輩，亦不聞有此學說」。他攻擊孫中山同盟會是「博一般下等社會之同情，冀睹徒、光棍、大盜、小偷、乞丐、流氓、獄囚之悉為我用，懼赤眉、黃巾之不滋漫，而復從而煽之」，必使國家「億劫不可復」。他還表示「雖以匕首搥吾胸，吾猶必大聲疾呼曰：敢有言以社會革命（即土地國有制）與他種革命同時並行者，其人即黃帝之逆子，中國之罪人也，雖與四萬萬人共誅之可也。」

梁啟超的這篇《開明專制論》對孫中山同盟會的攻擊，挑起了《民報》與《新民叢報》之間的這場論戰。這場論戰既是革命與保皇的論戰，又是社會革命即社會主義論戰，胡漢民則是這場論戰同盟會《民報》一方的主將。

1906年6月，胡漢民在《民報》第5期發表《斥新民叢報之謬妄》一文，他猛烈抨擊了梁啟超非難社會革命的言論。

一是梁啟超「所謂民生主義者，摭拾布魯仙士門麥喀等架空理想之唾餘，欲奪富人所有以均諸貧民」。其所說布魯仙士門麥喀，即是今譯蒲魯東、聖西門、馬克思。他直認民生主義者是摭拾蒲魯東、聖西門、馬克思的唾餘，又認蒲魯東、聖西門、馬克思為空想，是欲奪富人所有以均諸貧民云云，這自然既是附會，又是不懂社會主義特別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為何物，所以胡漢民直截了當地指出：「夫梁氏於民生主義無所知，以為架空理想，不能實現，本不足怪。但謂奪富人之所有，奪之一字，誰告汝者……均富之方法至多民生主義學者所主，不勝縷舉。梁氏不解所謂，則不知蓋闕可耳，而遂謬作是語，是決為無理謾罵不得自解也。」

二是梁啟超所謂「夫以歐美貧富極懸絕之社會，故此主義常足以煽下流」。胡漢民認為這是梁啟超不知民生主義為何物，而盡以輕薄之詞抹殺之矣。因此他又指出：「民生主義者，先覺之士見乎經濟階級之為梗於社會，而講救濟之方法，欲實現其平等博愛之思想者也。」而梁啟超所謂足以煽下流云云，不過是「信口開河，狂燥不止，不仁不智」。

最後，胡漢民一針見血地指出：梁啟超既不能在理論求勝，也無一定政見，其內心隱處則是「徒怯乎民族主義之日盛，而使彼保皇黨人無立足之餘地，故強起而爭之」。

1907年3月，胡漢民在《民報》第12期又以「民意」筆名發表的《告非難民生主義者（駁〈新民叢報〉第十四號〈社會主義〉）》一篇最終迫使《新民叢報》停刊的長文。這既是《民報》闡述民生主義最重要的著作，也是中國最早一篇社會主義論戰檄文。

在這篇長文中，胡漢民明確指出，梁啟超關於社會主義和社會革命問題之謬誤的「總根本」在「不識經濟學與社會主義為何物」，在經濟觀念上存在著八大謬誤：一是「以土地為末，以資本為本」；二是「以生產為難，以分配為易」；三是「以犧牲他部人而獎勵資本家為政策」；四是「以排斥外資為政策」；五是「不知物價之由來」；六是「不知物價貴賤之真相」；七是「不知地租與地稅之分別」；八是「不知個人的經濟與社會的經濟之分別」。梁啟超「自相挑戰，亦緣之而起」。

胡漢民集中批駁了梁啟超反社會革命之言論，闡述了同盟會行社會革命之論據。

首先是所謂中國不必行社會革命論。梁啟超認為，歐洲之社會革命論是「經由現今經濟社會組織不完善而來」；而中國自秦漢以來無貴族壟斷土地，無長子繼承權，亦無貴族與教會代收賦稅之富，其現今之經濟社會之組織「優於」歐洲，只要「稍加補苴之力，使循軌道以進化，而危險之革命手段非適所用」。胡漢民反駁說，梁啟超以歐洲經濟社會史為唯一之論據而不敢道及美國經濟社會史隻字。美國以新立之國，其初亦無貴族制度，亦無長子繼承權，亦無貴族與教會代收賦稅、壓制苛賤齊氓之蔽，但社會問題更形嚴重，今之言社會主義「急於歐也」。因此，要使中國經濟現象「不至陷於歐美今日之窮境」，必行社會革命。就是說，通過社會革命，先解決土地國有問題，使其不得入於少數人之手。「此所謂先患而預防也」。

其次是中國不可行社會革命論。梁啟超認為，中國不可行社會革命是因為要保護資本以與外國資本競爭，防止外國資本的侵入。這就是說：「中國今日經濟界之前途，當以獎勵資本家為第一義，而以保護勞動者為第二義。」胡漢民反駁說，中國近百年來的「窮蹙之象」是因為「生齒日繁，而經濟界生產分配之方法，不見其改良進步；並不是由於外資的輸入」。日本自與外國通商及改變生方法以來，其經濟界之活氣，還逐步增加，並以一後起小國與歐美進行國際競爭。這就是說，「梁氏抵排外資之政策，求之各國，無其類別」。中國土地歸於國有，也就是全國大資本歸於國有；唯有國家為大地主、大資本家，才足以造福於全體國民。並且中國具有經營大事業之能力，「則外資輸入有利無損」，即可補本國資本之不足而謀產業之發達。由此，中國可行社會革命。

最後是中國不能行社會革命論。梁啟超認為，解決土地國有問題並不能解決整個社會問題，徹底的社會革命是舉一切生產機關國有，這在歐美百年之後「猶未必能行之，而現在之中國，更無論也」。由此，中國只能行社會改良，而不能行社會革命。胡漢民反駁說，歐美社會問題是「積重難返」，中國則是「消患未然」。其處勢既異，歐美之不能者，「固不害為我國所能也」。他反詰梁啟超：所謂「圓滿之社會革命」究竟是何種程度？有沒有以條件之

多少為「圓滿」與否之方程式？是不是以絕對者為「圓滿」，相對者為不「圓滿」？他指出：「社會主義亦止言資本之大部分歸國有，不能謂一分資本歸國有。」他強調指出：「今之最能以《資本論》警動一世者，莫如馬爾克及因格爾士（引按：馬克思、恩格斯最早中譯名之一）。二氏不惟認許自由資本之私有，即農夫及手工業者之資本私有，亦認許之。」這就是說，社會革命只是實行土地和大資本國有，小企業小資本仍聽由自由競爭；並且「均富」也不是平分財產，而是人民機會均等，依其才能而定酬勞。」

革命派與改良派這場關於社會革命的論戰，在當時無疑從屬於資產階級革命範疇；但是卻又發生於馬克思主義已開始在中國的初步介紹過程中。論戰雙方雖然對於馬克思主義還沒有完全真切的瞭解，中國社會也還不具備馬克思主義生長的土壤和條件；但是，它卻顯然是中國人最初涉及馬克思主義社會革命的一場思想論戰。另一方面，在論戰中，胡漢民對於梁啟超的批駁，在論理上又是頗有深度的。他不僅廣涉歐美日本社會經濟發展的事實，而且能初步運用馬克思學說析難。從他在這裏的立論觀點和論辯方法，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對他的最初影響。進一步說，胡漢民與梁啟超這場社會革命論戰，實際上是中國第一場社會主義論戰，它是民國初年煮塵即王輜塵與杜亞泉、錢智修之間社會主義論戰和五四時期社會主義論戰之先聲。

二

1912年2月底3月初，中國出現了組黨熱潮，在湧現出來的許多政治團體也就是政黨中，以立憲派人士為主體，吸收部分舊官僚和從革命派中分離出來的革命黨人所組成的政團，它們的基本立場是擁袁反孫，對同盟會十分不利。袁世凱取得臨時大總統，同盟會又成為在野黨。這時，孫中山、黃興等才深感十分必要加強同盟會的組織建設，使它成為全國性的大黨。於是他們指定居正等人負責同盟會改組的籌備工作。

3月3日，同盟會在南京三牌樓第一舞台召開本部全體大會，四五千人到會，選舉孫中山為總理，黃興、黎元洪為協理，並選舉胡漢民、汪精衛、張繼、宋教仁等人為幹事，宣佈同盟會正式改組為公開的政黨。同盟會改組後的宗旨是「鞏固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同盟會改組為公開政黨後，在組織上得到迅速發展。但是，在思想認識上，仍然存在著嚴重分歧意見，會員既有激進派，又有穩健派。這兩派各自利用自己掌握的報紙，進行公開激烈的論戰。這就正如胡漢民所說，同盟會是以知識份子為主體加上流氓無產階級與華僑之小資產階級、工人階級構成並集合于知識份子旗幟之下的革命政黨。其廣大黨員既不覺悟革命不徹底之必無所得，又由其小資產階級之階級性決定，一旦稍免於壓迫之形式，即具有離開革命之傾向。再加上同盟會組織的不完善，黨于黨員，不能收以臂使指之效，亦不能深入群眾而領導之。所以一旦革命形勢發生變化，同盟會的種種弱點也就不能不表現出來。

1912年8月，宋教仁等人促成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協進會、國民公黨與中國同盟會合併，在北京成立國民黨。孫中山應邀出席成立大會，發表演說。孫中山以最大多數票當選為國民黨理事長，黃興、宋教仁、王寵惠等為理事，胡漢民等29人為參議。在中華民國成立後，國民也就是人民，因此國民黨的字面意義也就是人民黨。

有鑒於袁世凱的種種倒行逆施，孫中山決定再次東渡日本，重聚力量，再舉革命！他考慮，原國民黨人「談及將來事業，意見分歧。或緘口不談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種種灰心，互相詬誶」。為改變國民黨的這種狀況，這一次，他要組織革命中堅分子將革命進行到底。於

是1913年9月，孫中山決定籌組中華革命黨，自任中華革命黨總理。中華革命黨黨章共39條，其中最關重要的是「（一）本黨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二）本黨以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它規定，憲法頒佈以後，國民一律平等；並實行五權憲法和四院制即立法院、司法院、監督院、考試院等。

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胡漢民高度評價新文化啟蒙中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新思潮，認為它「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開個新紀元」。而中國之所以出現這種新思潮，「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在生活矛盾上。生活上常常在那裏發現矛盾，就給社會上所有的人一個大打擊。那些比較明白的人，因打擊而發生感觸，就想去解剖那些切近人生的疑問題」。雖然那些切近人生的疑問題並未解剖清楚，但是黑暗的現象卻被顯露出來，於是出現新思潮運動。日本思潮很發達，最大的原因也是生活不安。因此他提出，現在社會生活上的矛盾，我們應該去研究。

這年8月，孫中山還在上海創刊國民黨的理論刊物《建設》雜誌，並由胡漢民任總編輯。孫中山在《發刊詞》中規定《建設》雜誌之宗旨與目標是「以鼓吹建設之思潮，展明建設之原理，冀廣吾黨建設之主義成為國民之常識，使人人知道建設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設為易行之事務。由是萬眾一心以赴之，而建設一世界最富強最快樂之國家，為國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者」。胡漢民在《建設》雜誌尤其發表其撰寫的《唯物史觀批評之批評》、《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的研究》、《從經濟的基礎觀察家族制度》、《考茨基底倫理觀與羅列亞底倫理觀》、《階級與道德學說》、《孟子與社會主義》等多篇在當時理論水準最高、影響很大的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長文，從而使他成為五四馬克思主義傳播的突出代表。瞿秋白20年代甚至稱他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後來的事實表明他當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甚至還反對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史達林主義關於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與實踐，然而實際上卻為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啟蒙傳播作出了重要的學理貢獻。

這一時期，1909年入同盟會、時任援閩粵軍總司令的陳炯明(1878-1933)駐章州期間，還大講社會主義，建設閩南護法區，贏得了「模範小中國」的美譽。戴季陶也撰述了《從經濟上觀察中國底亂源》等傳播唯物史觀的文章，並且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籌建活動。

這就是說，從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經中華革命黨再到國民黨，都延續著同盟會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

三

1922年7月26日，蘇俄政府任命人民外交委員會副委員長越飛擔任派往中國的特命全權大使。1923年1月17日，越飛從北京到上海。他在同孫中山交換意見後，於26日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雖然，「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但卻使國民黨走上了以俄為師的道路，到1923年10月，孫中山還接受俄國政府外交代表加拉罕的直接推薦，委任負有重要使命的鮑羅廷為國民黨顧問。

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孫中山指定胡漢民和汪精衛、林森、謝持、李大釗五人為主席團主席。胡漢民在大會提出了國民黨的「民主集權制度」。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則是由共產黨人、中國國民黨顧問鮑羅廷和瞿秋白以及孫中山助手胡漢民、汪精衛草擬的。它再一次宣佈：中國國民黨之主義即孫先生所提倡之三民主義是已。它解釋說：中國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國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於間接民權之外，複行直接民權，

即為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且兼有創制、複決、罷官諸權也。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中國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也。中國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其最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蓋釀成經濟組織之不平均者，莫大於土地權之為少數人所操縱。故當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府，國家就價徵稅，並於必要時依報價收買之，此則平均地權之要旨也。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舉此二者，則民生主義之進行，可期得良好之基礎。它還宣佈了中國國民黨之政綱，提出了其對內、對外政策，並宣告，它所提出的這些對外、對內政策，「皆吾人所認為黨綱之最小限度，目前救濟中國之第一步方法」。

十分清楚，這個由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共同起草的中國國民黨宣言所表述之核心內容是民族獨立、民族平等之民族主義，一般平民所共有的直接民權即民主之民權主義，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之民生主義，加上聯共、聯俄（國民黨說的是容共、容俄）和扶助農工，不管是用共產黨人所講的新三民主義，還是中國國民黨人一以貫之的三民主義，都屬於社會民主主義。

四

中國國民黨之社會民主黨性質尤其體現其在台灣的實踐，這就是實踐其均富和民主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策。

中國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使蔣介石一班國民黨人不能不反省。他們總體上認為，中國國民黨不是被中國共產黨打敗的，而是被國民黨自己打敗的。於是，他們進行了一場類似中國共產黨延安整風式的中國國民黨改造、重整運動，促使以蔣經國為代表的國民黨少壯派的擢升政壇，促進三民主義在台灣的付諸實施，包括用國家贖金的方式把地主的土地免費分給無地或地少的農民，成功地進行了土地改革，既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民生綱領，又沒有破壞生產力，而使地主所得贖金投資工商業。中國國民黨在台灣還實行節制資本的既定方針，著力發展中小企業，注意防止貧富懸殊；注意勞動保護和醫療、救濟等社會福利事業。

中國國民黨的社會民主黨性質尤其表現在蔣經國主政時期。

蔣經國青年時期就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他的同學中有鄧小平等著名共產黨人，他本人也參加了聯共（布）而成為共產黨員。他在蘇聯的一家工廠工作，並在蘇聯娶妻生子，直到1937年國共重新合作才回國。經過乃父蔣介石親自安排的一段「閉門思過」之後，他出任江西贛南專員。他顯然是以共產黨的經驗治理贛南，嚴厲打擊社會犯罪，認真整治社會秩序，加上他本人的克勤克儉之平民專員作風，終於把一個爛攤子的贛南治理得「道不拾遺，夜不閉戶」，被當時國民政府譽為模範專區。

蔣經國在台灣擢升政壇後，特別是在他接掌台灣的最高權力後，全心全力推動了以交通、能源為中心的經濟建設，推動科學園區的建立，為台灣創造了經濟奇跡。在經濟發展之後，又大刀闊斧地推行政治改革，開放黨禁、報禁，進一步推動了政治民主化。所謂政治民主化，包括排除所謂威權的政治，奠定了一個政黨之間，政黨互動的一個模式。蔣經國還是深得台灣人民認同的平民領悟人。他輕車簡從，常常去農村渡週末，與農民話家常，肚子餓了，就在路邊小店自己解決。蔣經國這些可圈可點的政績，便成為台灣經濟起飛、政治民主化的基

本經驗，實際上也就是中國國民黨之社會民主主義政策的全面實施。

2000年大選，雖然使百年老黨中國國民黨失去政權而成為在野黨；但是，其所建立的政治民主化的機制還在，並且在台灣還不大可能重建一黨政治而逆民主政治的潮流而動。今日，中國國民黨正在為重新執政而努力，其理念也仍然是體現其社會民主主義政策的均富和民主。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五期 2006年10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五期（2006年10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